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新疆通史》翻译丛书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

# 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 契约文书

武内绍人◎著

杨铭 杨公卫◎译 赵晓意◎校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

# 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

武内绍人◎著

杨铭 杨公卫◎译 赵晓意◎校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 / 武内绍人著; 杨铭, 杨公卫译; 赵晓意校.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6.3

(《新疆通史》翻译丛书)

ISBN 978-7-228-18832-1

I. ①敦… II. ①杨… III. ①吐蕃—古藏语—契约—法律文书—研究  
IV. ①H214.2②D927.450.3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7898号

出版统筹 // 若 贤

责任编辑 // 若 贤

书籍设计 // 李晓瑜

技术编辑 // 杨 爽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 编 830001

电 话 0991-3652361

制 作 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乌鲁木齐科恒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6开

印 张 27.5印张

字 数 450千字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81.00元

# 前 言

新疆古称西域,地处祖国西北边陲、亚欧大陆的腹地。历史上,这里曾经是中西陆路交通的主要通道,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又是一个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汉,次年,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从那时起,新疆就划入了汉朝的版图,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为了全面、深入、正确地阐明新疆历史,包括各民族的发展史和宗教演变的历史,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2005年年初,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批准,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立项,决定编写多卷本的《新疆通史》,并成立了《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按照计划,《新疆通史》项目包括三部分,或称三大工程,即主体工程、基础工程和辅助工程。其中,辅助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翻译一批外国学者研究新疆历史文化的优秀成果。

众所周知,在远古时期,古老的黄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早期波斯文明、希腊文明就在新疆地区交融,众多古代民族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足迹。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使数千年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积淀比较好地保留了下来,新疆已经成为一处有着深厚底蕴和丰富内涵的历史文化宝地!

从19世纪70年代起,新疆丰厚的历史文化逐渐为国外学者所了解。来自俄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瑞典的各种名号不一、目的不同的探险

队、测量队和考察队,陆续走进这块古老而神秘的土地。当时,这些探险队在亚洲的中部,在中国西北地区不断发出有惊人发现的消息,轰动了世界。人们惊奇地发现,在被视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竟然会埋藏有数千年之久的人类古代文明。这里有写在木板、桦皮和纸张上无人识读的文字,有令世人惊叹的佛教石窟壁画,有雕刻各种精致花卉文饰的木器,有早至战国时期内地生产的精美艳丽的丝绸、绢画、雕塑以及漆器、铜器,有中国汉唐时期以及古罗马、波斯制造的各种钱币等等。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西部灿烂的古代文化,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西方出现了一批热衷于研究新疆历史文化的专家、学者,他们取得了一批非常有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不仅推进了新疆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而且促进了中国历史、中亚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的深入研究。

国外学者对新疆历史文化的研究,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如今,他们早已把研究领域扩大到了新疆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与他们经常进行学术交流,了解他们的研究情况,吸收他们优秀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编写好《新疆通史》是非常必要的。为此,《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邀请有关专家翻译了一些国外学者关于新疆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并从中选择了一部分,作为《新疆通史》项目“翻译丛书”公开出版。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使大家能够用世界的眼光,多角度、全面地了解、认识新疆的历史,更加热爱我们各族人民的共同家园!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

# 中译本序

我很高兴得知本人著作《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的中文译本,通过杨铭教授、杨公卫(尼玛扎西)副教授及赵晓意副教授等专家的努力,即将在中国出版。现在的译本无疑将使该领域一些学者更为了解和认识这本著作。

同时,在翻阅本书的中文译本及其英文初稿时,我十分汗颜地发现许多缺陷和不足,一方面这是由于我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是因为本书的出版是二十年前,学科领域已经出现许多新的研究成果。

然而,由于我本人一直较忙,无法对现在的版本进行完全的修改和更新。所以,我决定除了一些小的修正外保留作品原貌。鉴于此种情况,我希望就当时的学术背景来总结本书的要旨,并且试图结合最新的研究发展来定位本部著作。

当时在写作本书时,除了编辑的文献,如吐蕃历史纪年,王室年鉴,碑铭,古代吐蕃世俗文献(如信件、契约、法律文本及卜卦等)还没有进行广泛的研究。在我开展这些文献的研究时,我运用的是下面的两种方法:

1. 尽量研究各种文献的所有种类;
2. 集中于研究各种文献种类的格式及结构表达。

有幸的是,这种方法对于我们的研究证明是有帮助的。因此我能够在本书中表明下面几点:

1. 古藏文契约遵循严格的格式,如买卖、借贷和雇佣契约部分遵循汉

文契约格式。

2. 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几乎都由吐蕃王国时期的当地人撰写，如汉人和于阆人。

第二点揭示出藏文契约的多语种和多族群社会背景。这另一方面使我们疑问是否在吐蕃本土也使用同样的契约格式。然而，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同样的契约格式，包括信件、法律文书、神谕在吐蕃境内不仅被本族而且被其他族群广泛使用。同样的文献种类帮助吐蕃王国统治管理其广阔的疆域。

同样，文书严格的格式和结构也使西域诸族更为容易地学习藏文文字，这肯定也使他们在吐蕃王国统治结束后将藏文当作通用语言来使用。<sup>①</sup>

我希望尽管本书存在一些缺点，它仍将推动和帮助中国的同行对于本项研究领域产生兴趣。最后，我希望表达我对于中国同行的感激之情，感谢杨铭教授和杨公卫(尼玛扎西)副教授及赵晓意副教授在翻译和出版本书中的辛苦努力。

武内绍人

2014年8月21日

<sup>①</sup> 武内绍人：《古藏文的形成和演进》，武内绍人和林范彦（编）《藏语的历史发展》，《研究年报》，vol.49.2012. 神户市外国語大学：3-17。

# 前 言

就我所了解,本书是本世纪初期研究敦煌洞窟和新疆丝绸之路沿途其他遗址出土古藏文契约的第一本拓展性的研究成果。这些契约的日期,大多数为塔里木盆地南部和河西走廊处于吐蕃占领时期的9世纪前半叶,他们是现存的以古藏文书写的最古老的契约。

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对汉文和回鹘文契约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并得到广泛的利用。与之相比,古藏文契约的研究相对滞后,并且利用甚少。它们对于我们理解本地区中世纪初期文化的贡献还不太清楚。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发现并研究所有现存的古藏文契约,展现其全貌,为深入的历史和语言研究提供可靠的基础性资料。

在过去十年里,我寻访古藏文文本的主要收藏地,发现了许多过去不了解和未被研究的契约。虽然可能还有一些被忽视的契约,我认为本书收录了几乎所有的契约并进行描述。本书对所有文本进行整理性编辑和全面注解性翻译,包括照片翻制和字母索引。此外,本书讨论了它们的格式、年代、语言和古文字学的特点。特别注意研究其他中亚语言(如汉文、于阗文、粟特文和回鹘文等)对它们的影响,分析古藏文契约书写的多语言和多族群的社会背景。

本研究使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是语言学和文字学的观点。特别注意解释残损文本,辨认未知文字,澄清复杂表达,复原其潜在的格式。虽然我也涉及了历史和社会背景以及契约的法律特点,但他们对社会经济史和法



律史的贡献还有待于使用此书提供的数据的专家作进一步全面分析和深入研究。我希望本书能揭示迄今被忽视的一个领域,并为理解中世纪早期吐蕃和中欧亚地区的语言、历史和文化提供新的研究方法。

本书是我博士论文的修改和增订本,该论文于1994年1月提交给印第安纳大学中欧亚研究部。十八份新文本的解释和三份注释为新补充的材料,部分内容得到修改并更新。在书本写作过程中,我得到老师和朋友的帮助和建议。

首先,深深地感谢我的学术导师,克里斯托弗·白桂思引领我开始古藏文研究。一直以来,他不断耐心地鼓励我研究,没有他的指引我不可能完成目前的研究。我同样感谢印第安纳大学的其他老师和朋友,特别是土登晋美诺布教授和艾略特·斯柏林教授的慷慨建议和友谊。

我还要感谢我在京都大学的教师,西田龙雄教授启蒙我迈入藏—缅语言学领域,并担任我主要的学术导师。我跟随梶山雄一教授学习传统藏文,跟随佐藤长教授学习现代藏文文献。从我童年时代起,长尾雅人教授在学术和生活上给了我很多的指导。我同样感谢我的第一个藏文教师和朋友,尊敬的楚臣格桑教授,他教我藏语口语和藏族文化中的生活习俗。

我还需要特别感谢我的同事和朋友,森安孝夫、熊本裕、高田时雄和吉田丰教授。1983年,我们一起组织“青年敦煌学者”研究学社。通过与他们的合作研究,我学会了如何通过与其他语言比较,来研究古藏文文献的方法。他们通读了本书的草稿部分并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和评论,特别是在藏文文字中如何辨别汉文、于阆文、回鹘文和其他文字的姓名。

我同样从其他日本同行处获益匪浅,他们是北村甫、山口瑞凤、池田温、上山大峻、御牧克己和长野泰彦等教授及许多国外同行和朋友,黎吉生先生、乌瑞及达维·杰克逊教授,这里仅提及他们中的几位。

承蒙以下机构和负责藏品的同事的许可,我得以研究不同的手卷藏品,并发表它们的照片复印件:大英图书馆及斯坦因收藏品(副馆长格拉汉姆·肖先生及副馆员麦克·奥克菲)、法国国立图书馆及伯希和收藏品(馆长米·莫内克·科恩)、瑞典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及赫定收藏品(秘书斯塔芬·罗森教授),圣彼得堡东方学院和科兹洛夫、彼得洛夫斯基收藏品(馆长沃罗

比约卡-得沙托维斯卡亚博士)。

本书的研究及海外访问收藏品的旅行,分别得到科学研究基金项目(1991—1992)、国际科学研究计划(1992—1994)和三菱基金项目的资助。本书的出版得到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成果出版资助计划的资助。

我还要感谢那些给我提供重要而实际帮助的人们。他们是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坂口志先生、为音节检索编写计算机程序的内藤雅彦先生和大藏出版社的编辑谷村英治先生,他无私地接受本专著并对手稿进行仔细编辑。

最后同样需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绍晃和阿佐子,我的妻子佐知子和我的女儿香穗,感谢他们始终不渝的支持和关爱。我把本书献给他们。

# 目 录

中译本序 / 001

前 言 / 001

导 论 / 001

## 第一部分 契约研究

第一章 古藏文契约文书的分类 / 011

第二章 买卖契约 / 023

第三章 借贷契约 / 046

第四章 雇佣契约 / 089

第五章 古藏文契约的特点及其社会背景 / 102

## 第二部分 契约文献

契约文献 / 139

## 附 录

参考文献 / 361

地名、族名、部落名、吏职名藏汉对照 / 388

藏文与拉丁字母转写符号对照表 / 394

图 版 / 395

中译者后记 / 426

# 导 论

## 一、古藏文文献研究之现状

自20世纪初,人们在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上发现沿途的敦煌洞窟及其他遗址中有古藏文文献后,<sup>①</sup>这些文献就成为研究吐蕃甚至整个中亚的语言、历史及文化的无价之宝。古藏文文献的研究工作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由弗兰克(A.H.Francke)、托马斯(F.W.Thomas)、巴考(L.Bacot)以及拉露(M.Lalou)等著名学者发起,接着又有几代学者前仆后继,其中包括石泰安(R.A.Stein)、伯戴克(L.Petech)、佐藤长(H.Sato)、乌瑞(G.Uray)、麦克唐纳—斯巴宁(A.Macdonald-Spanien)、山口瑞凤(Z.Yamaguchi)、白桂思(C.Beckwith)等人。通过他们的努力,让我们对吐蕃历史、语言及文化的认识有了颠覆性的转变。

先驱学者们的贡献可以归纳如下:a分类或公布了每一类收藏品里的文献;b为藏学研究找出了重要的资料,并从中整理发掘出了重大信息。<sup>②</sup>然而,要在不同收藏品里找到所有现存的有价值的文献,对于研究者来说并非易事,所以有时在讨论一个未知词汇或短语的意义时,只有在与之相

---

① 这里的“document”指非宗教文献,但包含非教义文献,如占卜、医药及占星术之类。

② 有些学者称此方法为“寻宝”。

关的文献已经出版或被提及后,才能以它们作为参考进行研究。这样就常常造成对这种未知词汇或短语的“特别注释”。当时,想对古藏文文献进行全面的了解,比如“其间有什么?”“其间没有什么?”以及要在大量的写本中找到每一篇文献,比如“它是一篇独立的文献吗? 还有没有其他同类的文献?”也是很难的。

我认为,在20世纪末,我们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或者说是第三阶段。由于主要收藏品的写本照片及其微型胶卷的发布,还有每个收藏品的分类目录的刊布,<sup>①</sup>这使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内,在不同收藏品中查阅并比较许多写本。我们现在要做的一项工作,也许应该是把不同收藏品里所有的写本,按照目录内容、规格、日期等不同的标准进行梳理归类,然后创建一个详尽的数据库。做完这些以后,我们期望能看到一幅更加完整的古藏文文献图。比如说,哪些写本是原创的,它们出自怎样的社会文化和社会语言背景? 如此便可一目了然。

如果把古藏文文献当作历史资料或者语言学资料,那么对社会文化和社会语言环境的考察就特别重要。因为除了铭文之外,所有的古藏文文献并非全是在西藏地区发现的,而其中有的文献是在新疆与河西走廊发现出土的,很多写本明显是在这些地区写作的。这些地区以前居住的并非是吐蕃人,但曾在7世纪到9世纪处于吐蕃的统治之下。另外,就是一些来自吐

① 实际上,很多文献没有编目录,《拉露目录》包含伯希和收藏品里的大部分敦煌文献,总计2216卷之多。其余的,如P2217-P2224,以及P3500-P4450,主要是《无量寿宗要经》的抄本(西冈祖秀,1984),它们没有编入目录,而是存于微型胶卷中。斯坦因收藏品中的敦煌文献最初收编在《普散目录》中,此目录正在修订中,并以《东洋文库目录》作补充。虽然还有几类敦煌文献没有收编(如Or8210/S8550v、9223v、9286v、9323B、10646v、10647、10649v、10828A、B、11335、11401-09、11718、12321、12818;其中还包括汉文文献,均交由荣新江教授编目)。斯坦因收藏品也包含写本及木牍,它们来自丝绸之路南边的遗址(如米兰、麻札塔格、卡达里克、达马沟、牙通以及巴拉瓦斯特),还有吐鲁番盆地(如小城堡及吐峪沟),托马斯(TLTD2)刊布的仅是这个收藏品的一小部分(大约1/4)。我已发现600多件写本和碎片,目前正在为它们做详细的目录。另外还有大约2000多枚木牍没有编目。马洛夫收藏品中的木牍,由沃罗比耶夫-捷夏托夫斯基出版(1953,1955)。奥登堡和科兹洛夫等收藏品中的古藏文文献没有出版相关的目录,只有萨维茨基近日出版的一组《无量寿宗要经》的写本(1991)。而斯文赫定收藏品中的古藏文文献,其最新的信息已经由我发布(《赫定》)。德国收藏品里的文献由童丕出版(TBT)。大谷收藏品里的文献已经由我刊布(《大谷》)。

蕃中心地区的写本,包括《赞普纪年》、《大事纪年》、信件及官方急件、佛教文献等等,<sup>①</sup>它们很多即使是藏文的,但也不是吐蕃当地居民所写,而是由汉人和于阗人所著,因此它们大都反映了当地社会的情况,而非吐蕃的社会情况。这些内容我们将在第5章里介绍。我们要认真分析古藏文文献的社会背景及社会语言背景,以便准确地重现吐蕃统治其他地区时的真实历史。将它们用作语言学资料研究时,由于它们很多都不是吐蕃本地人所写,所以可以设想其与吐蕃本土的语言不同。<sup>②</sup>

考察文献的社会语言背景也揭开了古藏文文献的另一篇章。乌瑞的《吐蕃统治结束后甘州和于阗官府中使用藏语的情况》是一篇突破性的研究成果,<sup>③</sup>让我们看到在河西走廊及新疆等吐蕃曾经统治的区域里,其他民族运用藏文的情况,因此古藏文写本的年代最晚可能要迄止到11世纪初。有了这个突破口,我们可以借此寻找出其他文献,以便把它们恰当地编入新目录中(对照:乌瑞的《敦煌出土吐蕃文献新探》;<sup>④</sup>武内绍人的《一组归义军时期的古藏文信函:古藏文书信类型初探》<sup>⑤</sup>)。

## 二、研究古藏文信件、契约及占卜文献的方法

要给古藏文文献分类,就得尽可能彻底地从各种收藏品里收集到相关的写本。在我初步的调查与尝试中,我渐渐发现可将它们分为信件、契约及占卜文献三大类。信件是最多的,而契约与占卜文献也不少,几乎所有收藏品里都是这三大类。我也发现这三类文献可作为最有价值的语言学资料,因为它们既不像佛教文献那样是语言的翻译,也不是带有文学色彩

① 敦煌石窟出土的《赞普纪年》及《大事纪年》可能是在敦煌抄写的,但它们的原稿应来自吐蕃中部。

② 常常很难从方言变化中区分它们,沃罗比耶夫-捷夏托夫斯基(1953)首次指出了米兰木牍中的方言类型。

③ 乌瑞《甘州和于阗》:81-90。

④ 乌瑞《新成果》:514-528。

⑤ 武内绍人《信函》。

的编年体文献(如《大事纪年》)。<sup>①</sup>它们提供了很多相同的句子,而同一个环境中会出现不同的单词,反之亦然。这些资料帮助我们得以了解那些未知的词汇的意义。<sup>②</sup>它们也包含了很多古老的语句,这些是研究习惯用语形成过程的重要资料。

另外,这三大类文献最重要的一个共性是:这些文献都是根据某一类惯用的语句来编写的,也就是说,有古藏文信件常用语、古藏文契约常用语以及古藏文占卜常用语。在信件中,地址格式、问候用语及封印等都有明确的格式。在我以前发表的文章(《敦煌·トルキスタン出土チベット语手纸文书の研究序说》<sup>③</sup>《一组归义军时期的古藏文信函:古藏文书信类型初探》)中,<sup>④</sup>我曾尝试以三种基本类型来划分信件常用语。至于占卜文献,至少有5种常用语,不过对此我还未能完成更深入的研究。

常用语在契约里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因为那时整个文献必须用常用语来书写,<sup>⑤</sup>所以各种契约包括了模式化且独特的语句。它们并非都遵从语法规则,因此要与基本的常用语相联系才能理解。<sup>⑥</sup>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阐述每一件文献的内容就得先弄清这些习惯用语。了解这些习惯用语以及典型用语,也能使我们找到零散的文献,并重现它们遗失的部分。<sup>⑦</sup>所以,在研究那些信件、契约及占卜文献时,我一再强调运用惯用语的重要性。

惯用语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们全部或者一部分,可能是通过文化交流而引进的外来语。例如“看来这是比邻(或)遥远的地区”的句型,就出现

① 《大事纪年》中的文学创作部分见武内绍人《史记》:142-143。

② 此类案例以及习语形成过程,见武内绍人《信函》,175,fn.1,2。

③ 山口瑞凤监修:《チベットの仏教と社会》,东京:春秋社,1986,563-602。

④ 武内绍人《信函》。

⑤ 就汉文契约而言,比如展示基本用语的《书仪》等出自敦煌的文献,如S.6537v,参照池田温《契约文书》。

⑥ 比如,短语“mchid-kyis vtshal-ba”频繁出现在契约中,通过语法分析很难理解这种表达,但它总是出现在同样的语境里,也就是保证人的赔偿陈述中。从其文献内容以及汉文契约中相关陈述的对比来看,这种语句的意思是“负(全)责”。

⑦ 此类案例,见武内绍人《信函》,176,fn.5,以及本书第二部分“契约文献”中,文本no.42-57的考释。



在了于阗、粟特以及回鹘文的信件中。<sup>①</sup>此外,吐蕃、于阗、吐火罗、西夏、韩国及日本等邻近地区,对中国式“画押”或者“私章”的运用,也是文化借用的一个例子(比较5.2节)。古藏文占卜文献运用骰子的做法,与回鹘《占卜文》(irk bitig)有着惊人的相似。所以,把古藏文文献的惯用语与其他语言相比较,就会揭示藏文惯用语的形成过程,并帮助我们了解在不同语言和民族间有哪些文化交流。

以上述方法为基准,我以古藏文契约为研究重点,讨论它们的结构的特点及其产生的社会及社会语言背景。

### 三、古藏文契约研究的目的及进程

在敦煌石窟和新疆的其他区域,如米兰(Mīrān)、麻札塔格(Mazār. Tāgh)、老达马沟(Old domoko)、卡达里克(Khādalik)以及吐鲁番盆地,出土了一批数量庞大的古藏文契约文书。托马斯教授开创性地为人们提供了各种契约的翻译文本,尽管他没能辨别出哪些是契约,那些不是。自那以后,除了对个别文献的翻译外,没有人对这些契约文书进行过系统的研究。<sup>②</sup>由于上述翻译没有与其他契约相比较,也没有使用那些惯用语作为诠释工具,所以整个古藏文契约文献的全貌,比如“有多少契约,有哪些种类?”至今不得而知。因此,我研究的初步目的就是尽可能广泛并且彻底地查阅古藏文契约。我的工作进程如下:

1. 尽可能详尽地收集并调查这些古藏文契约文献;
2. 根据它们所使用的惯用语,将它们分为不同类型;
3. 为每一种类型设定契约的惯用语。

为了核实其结构特点,如纸张尺寸及质量,辨读模糊的字母及封印,测

<sup>①</sup> 于阗文信件方面,见恩默瑞克(1975:225-226);回鹘文见特斯坎和西默(1971:455-457)。粟特信件中的信息由吉田丰教授发现。

<sup>②</sup> 比如,王尧、陈践(1983)对P1115、1118、1297的翻译,以及山口瑞凤(1985:506-507)对P1095的注解。我自己发表了一些有关契约的文章:《家畜买卖》《赫定》《买卖》,这些文章中的观点已引入本书并做了更新。